

“礼乐和合 探知齐鲁——山东文物特展”在港开幕



这是5月28日在香港文物探知馆拍摄的展品。

新华社香港5月28日电“礼乐和合 探知齐鲁——山东文物特展”28日在香港文物探知馆开幕,通过展出珍贵的山东及香港出土文物,让公众了解独特的齐鲁文化,体会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此次展览共有60套(约200件)精选山东文物首次在香港展出,重点展品包括中国史前制陶技艺巅峰之作“蛋壳黑陶镂空高柄杯”、新石器时期只供贵族使用的“白陶三足盂”、山东史前文化象征器物“红陶袋足鬲”等,其他展品包括玉石器、陶器、铜器和乐器,阐释齐鲁文化由新石器时代到明代的发展历程。

展览同时展出香港重要出土文物,包括牙璋、石钺、石串饰、石英环、镂空彩陶盘、白陶镂空圈足盘、带把鸟形陶壶等。

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开幕仪式上表示,此次展览通过对比山东与香港在三个同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比较两个不同地域文化的相近之处,多角度展示中华古代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和同根同源的特征。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6日。

《三千儿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展开对红二十五军的历史观照

近日,《三千儿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新书发布暨纪念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座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该书是一部完整讲述红二十五军长征故事的青少年通俗军事读物,全景式再现了这支队伍历经艰险转战近万里的战斗历程、雄奇历史。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表示,《三千儿郎:从鄂豫皖到陕甘边》尊重史实、思想厚实,但不刻板、不说教,用英雄的个体刻画和群像塑造,展开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观照。书中有鲜活的人物、生动的故事,同时也有作家本人鲜明的写作特色,为新时代文学如何向红色文化资源汲取精神能量,进行了积极有力的探索。

河南省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梁莉分享道:“该书以严谨的历史态度和全景式叙述方式,紧扣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时空脉络,全面展示了这支年轻的红军队伍英勇战斗的历程和这个英雄群体的精神风貌。”她还表示,该书以70个具有内在时空和逻辑关联的小故事,串起了红二十五军的整个长征历程。该书着眼青春,关注传承,呈现红二十五军“娃娃军”“儿童军”的鲜明特点,充分展示了这个群体的朝气蓬勃、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

该书作者尹霞谈到,写作目的不是讲述几场惊心动魄的战斗,或者描述震撼人心的大场景,或者解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而是要向读者讲出满怀理想、积极向上、充满力量和智慧的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故事,展示朝气蓬勃的英雄群体,从中感悟他们神勇无敌的精神,从中汲取奋发进取的力量。

(据《北京日报》)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上映 送给“小学生”别样的礼物



《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剧照。(资料图片)

近日,由饶晓志监制、梁琳担任总制片人、王子川执导并担任编剧的电影《朱同在三年级丢失了超能力》上映。影片讲述了三年级小学生朱同成绩垫底、调皮捣蛋,每天他的小脑瓜里都会出现一万种幻想。有一天,他发现班主任牛老师居然在走廊上追打外星人、草坪中的小花会说话……无数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件纷至沓来,离奇幻想与学校生活苦恼交织。

电影用小学生的视角为观众开启了全新的看世界角度,力求在“六一”假期到来前,为广大“过期小学生”送上一份别样的治愈礼物。

影片从2023年起多次参与国内各类电影节展映活动,并在第十七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中斩获最佳导演、最佳艺术探索、观众选择荣誉评分第一名等诸多奖项。主演岳昊荣获第二十五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男演员。导演兼编剧王子川也凭借本片夺得了第十九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年度最佳新晋编剧。

导演兼编剧王子川曾表示:“这不仅是一部儿童片,也是适合成年人观看的电影。”许多观众观影后表示:“我的童年被拍成电影了。”也有人携儿时玩伴一同观影,惊呼“仿佛我们一起回到了小时候”。更有观众发出深深地感叹:“也许真正丢失了超能力的不是朱同,而是不再能用小孩子纯粹美好的眼光看世界的我们。”

(据《贵阳晚报》)



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博物馆。

开拓创新 形成体系

二里头文化在广泛吸收各地先进文化因素基础上,进行整合、改造提升,在二里头都邑集中体现了诸多史无前例的创新。比如,形成了从都城选址、多网格布局、宫室建筑、多级墓葬、祭祀遗存,到青铜、玉及绿松石等礼器共同构成的礼乐制度体系,使二里头文化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在短期内迅速崛起,发展壮大。

二里头文化800多个聚落,以二里头都邑为核心逐层分布,形成“众星捧

月”式的分布格局,建立起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高等级聚落分布在交通要道和区域中心位置,或者重要资源附近,控制交通和资源,又对二里头都邑进行拱卫;低等级的聚落则广泛分布在中原地区,依附于较大型的聚落,拱卫和支撑着较大型聚落。这些聚落的文化面貌均与二里头都邑保持高度一致,共同组成二里头文化的多层次聚落结构治理体系。

青铜礼制 引领后世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罍。

二里头文化是商王朝早期阶段的二里岗文化主要、直接的源头,对其城市规划和设计理念、建筑布局、宫城宫室制度、墓葬制度,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礼乐制度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里岗文化还受到二里头文化青铜礼乐文明的强烈影响。二里岗文化继承了二里头文化的铸铜技术、铜器种类、组合、造型、装饰、功能和风格,特别是继承了使用青铜礼器的一系列制度。二里岗文化铜礼器在品种、器物造型、装饰及铸造技术上有很大发展,但其核心仍然是延续二里头文化的酒器组合。二里头文化创立的青铜礼乐文明,为商周文明奠

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确定了商周青铜文明最重要的内涵、模式,并与商周文明一道,构成早期华夏文明的基本特质和发展主流。

二里头文化的礼乐文明达到强盛之后,虽然已经具备了极为先进的生产力水平,并且控制了中原地区的资源和交通,但二里头王国并未选择以军事形式向外扩张,征服其他地区,而是以二里头王国所在的嵩山区域为中心,向外推广其先进的生产技术,将其创造的文明成果用和平手段积极向外传播,以牙璋、铜铃、镶嵌绿松石铜牌饰、白陶等礼器为主要载体,将其政治、礼仪、制度、思想等传播到周边地区,用礼制秩序来维护二里头王权的统治地位。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礼器陶盂(或鬲)、爵,向北见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南及长江流域的浙江到四川等地,西达黄河上游的甘肃和青海。二里头文化的重要礼器——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同类的牌饰,见于齐家文化、三星堆文化。作为二里头文化核心玉礼器的牙璋,经南阳盆地传播至汉水流域,进入长江水系,再向西南经四川盆地直达越南红河三角洲;或经湖北、湖南向福建、广东、香港扩散。这种礼制的传播,使二里头文明实现更大范围的扩张,最终建立起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确立了中华文明礼乐制度的基本特质,奠定了古代中国的物质和文化基础,引领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成为后世中华文明礼乐文化的根和魂。

(据《光明日报》)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



植根中原 兼收并蓄

在二里头文化诞生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发展与积淀,从李家沟、贾湖一期文化至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连续发展,序列完整,具有极强的连续性。距今1万年左右,李家沟遗址开始出现少量的粟、黍及稻的栽培,生产并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贾湖—裴李岗文化早期,农业获得初步发展。贾湖遗址出现村落和公共墓地,出土的骨笛、甲骨契刻符号、大量的绿松石加工饰件、象牙制品、占卜用的龟甲、较为精美的陶器和工具,证明贾湖先民已达到相当高的文化水平,文明开始起步。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面貌空前一致,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整合:聚落规模出现明显差异,出现以大型中心性聚落为代表的多层次区域聚落结构,聚落内部出现布局有序的特大公共性建筑、精细构筑的住房房屋,出现体现审美和信仰的彩陶,这些表明中原地区已出现社会阶层与等级的分化。

随着四面八方的考古学文化涌入中原核心区,文化相互影响、交融程度加深,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先民继承了本地的文化传统,

从以陶器为主的文化谱系来看,二里头文化主要是在中原地区嵩山南、北的煤山类型和王湾类型融合基础上,大量吸收了豫东的造律台及豫北的后岗二期文化,以及东方、西北方向的陶器文化因素,经短暂的新石器快速发展而形成的。除了陶器谱系外,种类多样、制作精细的工具,发达的农业、畜牧业,先进的夯土建筑技术,院落式夯土建筑格局,居葬合一的聚落结构等,均展现出二里头文化与中原史前文化的高度连续性一致性。

在当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二里头文化以极强的包容性吸收来自各地的先进文化因素,形成多元的文化特征。除了文化方面,二里头都邑的人群构成也体现出二里头文化的包容性。根据锶同位素比值的分析,二里头遗址人口和动植物资源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周边地区。在二里头,发现了兼具偏北方的粟、黍类饮食习惯和偏南方的稻类饮食习惯,各网路区域中的墓葬也有不同的头向和随葬品种类。本地文化传统和多元人口、资源的汇集,为二里头文化的诞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铜瓷匠人杨涛:

锤下再造 残瓷“重生”



杨涛铜瓷修复的茶壶。



杨涛铜瓷修复用的各种锤子。

2021年11月,在杨涛和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淄博铜瓷列入山东省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3年9月,杨涛被淄博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聘为客座教授,讲授文物修复和保护研究课程。

尽管在保护和传承铜瓷技艺方面取得了进展,杨涛也坦言,在现代工业品非常发达的今天,几乎很少有人将损坏的日常瓷器送去修复,许多从事瓷器修复工作的人也纷纷转行,仍坚持在一线工作的屈指可数,且大多近年花甲,铜瓷行业面临着人才断层、技艺失传的危机。目前,杨涛在努力提高铜瓷工艺品附加值的同时,还致力于开发新设备和工艺,提高铜瓷工艺品制作效率,让喜欢它的普通人也能消费得起,重建铜瓷技艺的群众基础。

“铜瓷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结,代表的不仅是一种手工艺,更是传统文化的延续与传承。”杨涛说,“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把铜瓷从手艺变成艺术让更多人喜欢,这门老手艺才能真正传承下去。”



杨涛在工作室用铜瓷技艺修复破损的瓷器。(据新华网)

对家传手工艺兴趣浓厚。太爷爷留下的一副铜匠挑子是他儿时最早的玩具,“铜盆、铜碗、铜大缸”的吆喝声贯穿了他的童年。杨涛成年后,父亲一度不支持他当铜瓷匠,他就自己收集废铜做铜钉,找来破损瓷器练手。

25岁那年,杨涛正式成为一名专业铜瓷师,开始遍访全国各地的铜瓷名师提高铜瓷技艺。经过30多年刻苦钻研,他总结出铜艺行当里铜件、补件、配饰、镶饰的72种方法、136道工序,恢复了失传多年的木制铜钉、花式定位开壶等传统技艺。同时,他在继承传统铜艺的基础上引入现代科技,在新材料和热处理工艺方面不断探索,制作出内径仅1毫米的铜钉,从而使铜瓷更加精致、美观。

2018年开始,杨涛应邀参加首都博物馆明嘉靖青花鱼藻纹残损大缸修复工作,并承担铜钉修复任务。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这句俗语源于我国古老的瓷器修复技艺——铜瓷。铜瓷匠人使用钻、铜钉等工具,将破碎的瓷器修复得滴水不漏,使其可以重新使用。

在铜瓷师杨涛位于山东淄川的工作室——铜合居,一件件铜瓷修复的艺术品在经历“破碎与重生”后,更显独特气质。“以前的铜瓷,就是把打碎的瓷器拼好,用金刚钻钻孔,再用像订书针一样的金属‘铜钉’嵌住抓牢。现在,铜瓷能使破碎的瓷器复原再生,变换成另一类具有观赏和艺术价值的瓷文化工艺美术品。”杨涛对铜瓷颇有心得。

近些年来,杨涛在残瓷器和完整瓷器上进行二次创作,以铜钉镶嵌贵金属图案。“装饰性铜瓷”将原本的修补技艺提升到艺术高度,为这项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年届六旬的杨涛是杨氏铜瓷第五代传承人,自幼受爷爷、父亲熏陶,